

许多作家都有一个文学的故乡，那是他们灵感的源泉。对作家叶辛来说，贵州就是他的文学故乡，是他苦心经营的艺术殿堂。叶辛与贵州已有55年的情缘，他一直书写着贵州。这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了浓郁的地域色彩，保存了时代的记忆，呈现出了“文学里的贵州”。

——编者

写了一小篇《我写贵州山水》，发表在《新民晚报》上，上海的一位读者给我发来一条微信说：“看完你写的这篇，我一定一定要再去一次贵州。”

这位读者是个身居要职的女干部，接着她又意味未尽地补充了一句：“叶老师写的不仅是贵州，也是自己的青春哟。”

我久久地凝视着这句话，觉得一下子被她的这句话打动了。我一边发微信向她道谢，一边加了六个字：“你真的很敏感。”心里说，她岂止是敏感，看文章的眼光还十分犀利。很少有读者从我写的小散文中读出我的内心。她回了微信解释：“我妈妈也是知青，到大兴安岭。她也常常说起那里的树木森林、蓝天白云，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她在说她的16岁。”

哇，原来是这样！她是从我写贵州山水的文字中，读出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曾经度过的青春岁月的感情，对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土地的感情。似乎是一晃眼的工夫，我和贵州结缘整整55年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真是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话。

今年春节年初四那天，砂锅寨的杨村长邀请我去他家里过年。他说，叶老师这些年，年年

都回贵州来，但大都是夏天来的，冬天从来没有回过砂锅寨。冬天好玩哪，一是农闲时节，二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你和他们都可以摆摆龙门阵，听听他们讲打工生活的辛酸、打工的不易。

我让孩子开车，在年初四送我去了小杨家。砂锅寨是我插队落户当知青10年7个月的村子。

1969年4月3日的傍晚，在一帮老乡大人娃娃的簇拥下，住进茅草房的情形，仍历历在目。1979年10月31日，我办理了所有的户口迁移手续，把关系转到贵州省作家协会，告别砂锅寨，走上门前坝小山冈，转身凝望这个村落的情形，同样时常涌上我的心头。

转瞬之间，竟然整整55年过去了。小杨村长的父亲，当年也曾是我教过的学生，在他家火炉边坐定下来，不一会儿就围起了团团一屋子的人，年长的农民讲故事，讲我们几个男女青年在砂锅寨生活、劳动的细节；年轻些的农民就讲他们今天的故事——外出打工时难忘的经历、回到山乡的感受。镇上正在春节休假的干部闻讯来了，当年和我一起耕读小学教书的石老师也从砂锅寨下边的大坡脚上来了。石老师今年90岁了，我们挤在一个小办公室里教书时有好些共同语言。但他现在已是高龄老人，我事前给小杨打招呼，不要让他走这么长的山路过来了。但是小杨说，我不跟他说，事后他一定会发

55年的贵州情

□叶辛

脾气，训斥我。不要紧的，我们有年轻人陪着他，并且把他安全送回家中。

于是，吃过晚饭又坚持摆龙门阵，一直聊到了十点后，想到要开回省城贵阳，还有一个多钟头，我才和砂锅寨的老少乡亲依依惜别。这天夜里，回到我的驻地，已经过了12点。

平时到了这个点，我已经睡熟了。但是年初四这天夜里，我睡不着。砂锅寨的10年7个月插队落户生涯，只是我与贵州结缘的55年来的五分之一，也只占了我实际在贵州生活20余年中的一半。但是这第一阶段的10年7个月，让我真正懂得了山乡里的各族农民，懂得了农村，懂得了栖息在这块山地上人们的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打发着人间的白天和黑夜。

正是在砂锅寨的劳动、体验、思考和写作，使我在这块土地上成了作家，调进了作家协会工作，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当上了文学刊物《山花》主编。这一段人生又让我认识了省城的社会，在人大代表团里，在当选为文联副主席的十多年中，我又认识和接触了各界人士，和他们交朋友、谈家事，并且借着慰问、采访的机会，几乎走遍了贵州全省的山山水水。

直至1990年夏日我调回上海，这一阶段可以视作我和贵州亲密接触的日日夜夜，我已习惯了贵州的春夏秋冬，无论是湿冷的冬天，还是温暖的春日，我都觉得生活得安逸自在。

1990年初秋，由于我母亲患白内障，术后效果不好，双目几近失明，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批准了我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自那时到2013年，可以说是我的贵州情的第二阶段。那些年里，我一直记得贵州有位老领导说的话：“回到上海，你的生活一定更加安定了，但你要记住，工作的同时，仍然要继续写作，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

虽然我上海新的工作有个适应的过程，但在上班之余，我仍坚持把在贵州开了头的《孽债》写完了，并且陆续完成了其他长篇小说，如《华都》《上海日记》《缙溪之恋》和《问世间情》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只要写到农村，都会有贵州元素。我在写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将乡村生活和都市生活相比较。都市生活自然以上海为



主，而农村呢，总是会与西南山乡有关，和贵州有关。

还有一件趣事，由于上海作家协会机关在市中心的一幢名为“爱神花园”的别墅楼里，较为好找，经常有认识和不认识的贵州老乡来找我。门房的一位老同志，也是农场退休的一个领导，给我开玩笑道：

“要不，我们在作家协会牌子旁边，加一块‘贵州第二办事处’的牌子吧。叶老师，来找你的贵州人太多了。”

2013年末、2014年初，我从行政岗位上退了下来，空闲的时间多了，几乎年年夏天，我都回贵州度过。一来是参加省里的文学、文化活动；二来爽爽的贵阳能使我静下心来，写作一些新的作品。远的不说，仅2019年以来，我就写出了长篇小说《九大寨》《晚秋情事》《魂殇》《婚殇》《恋殇》。这几部书，几乎每一部都是在上海写出了开头部分，遂而到贵州完成的。当然，也有在贵州开了头，后来在上海完成的。

也是在这十几年中，我有意识地走遍了贵州的9个省、州、地区。记得66岁那年，《人民日报》邀我写一篇新年展望的金钱草。我写了：66岁，走过了贵州省里的66个县。到今年为止，这数字已经增加到了79个。需要说明的是，我讲的到过这个县，指的是在这个县里住定下来，采访过和参观过的县、区、市，如果仅仅是路过，88个县、区、市我早到过了。

我的身份是小说家。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长篇小说《蹉跎岁月》被评为“新中国

70年70部典藏”；2021年，长篇小说三部曲《巨澜》被评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百部红旗谱”，誉为红色经典。

实事求是地说，这两部作品的创作，都和贵州有关系。《蹉跎岁月》不用说了，那是根据我在贵州山乡插队落户10年7个月的生活体验写出来的。《巨澜》三部曲，其知名度不如《蹉跎岁月》和《孽债》。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也曾出版过6个版本。每一次再版，无论封面怎么换，内容简介或是提要中，都会重复出版时的这句话：“……小说紧扣时代的脉搏，深切地关怀人民的命运……”

55年过去了，人生不可能有第二个55年。近些年来，我来到贵州，目睹了山乡里的巨变，目睹了贵州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村寨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由衷地为包括砂锅寨在内的乡村巨变而喜悦和高兴。亲眼看着砂锅寨近年来在宅基地上新建的三层楼、四层楼，甚至五层楼的房子，走进坝坝，遇到当年一起在坝田山坡上劳动的老人含饴弄孙、享受晚年的画面，我几次都在心里问自己：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所有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变化，都是真的，故而有感而发，我写下了共计有200多篇和山乡有关的风情散文、民族散文、人文散文、山水散文，出版的散文集也有好几本了。我相信，这些印成书的文字，随着时光的流逝，会有意义、有价值的。只因这些文字里饱含着我半个世纪以来的贵州情。



立夏时节，马兰花开的时候，我再次走进了罗布泊核试验场。这里的一切都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中开始，又在“风不要说、云不要说”中结束，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暴烈的阳光下，独有“永久沾染区”的花岗岩石碑静静地矗立在贯通古今的戈壁荒原上。

20世纪80年代末，我自古城西安乘绿皮火车一路向西，穿越河西走廊、翻过天山达板，来到了这块被誉为“死亡之海”的洪荒之地。在青春勃发的年岁，我走进了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息息相关的伟大事业，也走近了操着东西南北口音的个个无名英雄。

本就晚婚的专业军士庞军锁，结婚5年一直没有孩子。那年春节前，他满怀即将做父亲的喜悦回家探亲，爱人如期生产，他有了一对双胞胎。

这孩子可谓来之不易。庞军锁是核试验场操作特种装备的操作手，脚撵脚的国防施工任务给不出他多少时间，加之女方一听他在新疆当兵就不再见面，如此这般一路上一年走下来，就过了而立之年，走在“奔四”的路上。后来经人介绍从邻县找了个对象，相互都满意，很快就结了婚。但庞军锁是在罗布泊为核试验切脉服务的人，繁忙的工作中一直没能要上孩子。

这一次，爱人不但生了，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庞军锁觉得这世上没有比自己更幸福的了。可谁也没想到，爱人和孩子还没出院，不幸却接踵而至，一个孩子患上了低蛋白水肿，另一个又患上了肺炎。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收到了“立即归队”的电报。他心里明白，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自己不是关键岗位的关键人员，部队无论如何不会发电报催自己提前归队。电报就是命令。庞军锁掏出了身上仅有的钱雇了一个人照料妻子和孩子，又蹒跚路路踏上了归队的路途。

六七月的罗布泊荒原，骄阳似火，赭气蒸腾，胶鞋一踩上地面就散发着刺鼻的橡胶味。但操控台上的庞军锁在胶质防毒衣内又穿上了绒衣、棉裤。他有关节炎，由于全封闭式作业酷热难当，战友相互间用水枪喷水降温。这一降，关节炎变成了风湿腿，每次下班都得靠战友把他从操作台上搀扶下来。领导让他撤场治疗，他执意不肯，最后被团长强行送进了医院。当基地首长前往医院看望，可病床上已没有了庞军锁，他已搭便车赶往了100多公里外的试验场区。

30多年后的2017年初冬，马兰基地筹备60周年庆典，我又见到了已转业多年的庞军锁。“不后悔。如果部队需要，我还会这么做。大家都是这么做的。”那次见面，庞军锁没有怎么谈自己，初冬的阳光下，他给我讲他的战友，讲大家为之奋斗的事业。

像庞军锁一样，专业军士王发元也是被电报催回部队的。那时候王发元本来已经转业回了地方，

英雄无言

□徐青

但因为他是关键岗位的技术骨干，组织多留了一年。王发元带领人员圆满完成任务后，部队派专车把他送到乌鲁木齐（那时从马兰到乌鲁木齐只能坐过路班车），再送上了回家的列车。近半年，王发元转业的工作终于有了眉目，可就在这个时候，部队的电报也到了他的手里。

这放在谁头上都是一个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难题。自己已被部队多留了一年，再回部队意味着又得多干一年不说，关键是已有了希望的工作就没了保证。更让王发元头疼的是，这一次老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一辈子在泥巴里抠饭吃的老人，为了他的工作硬着头皮四处求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走不又打了水漂？

“你敢迈出大门一步，我就砸断你的腿……”老人拍着桌子朝王发元吼。

王发元知道父亲的顾虑，他也不知道这封电报发出前部队领导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更清楚这一回队，将是至少再多服役一年……

无论如何必须归队，那里需要自己啊！他跪在父亲面前：“咱一个农民的儿子，部队给转志愿兵，不就是看咱技术过硬么？爸呀，我求你老人家了，让我走吧！”

父亲终究没有留住王发元。在庞军锁回部队的第二天，王发元也走进了营院大门。

核试验场的官兵对营院大门都很有感情。这倒不是用钢管和麻黄草绑扎起来，再喷上绿漆的大门有多巍峨气派，而是因为大门上有一副对联：“举杯邀月怨儿郎无情无义无孝；献身国防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听胡祖臣政委讲，早些时候一位战士接到母亲住院院的电报后，人回不去，就寄了些钱。可过了一个多月，汇款单又从邮局转了回来，但在附言栏多了一句话：“不要钱，只要人。”战士的教导员流着泪拟就了这副对联，挂上营门后，战士们每年都会用红漆描几遍。

专业军士涂庆荣当年也是从这个营门进入老连队的。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10多年后自己会把这副对联贴在自家大门上。他觉得只有这副对联才能表达自己的复杂感情。

那是1994年元月的一天，一封“父肝癌晚期，生命垂危，盼速回，妻”的电报送到了涂庆荣手里。当时任务正紧，已是技术骨干的涂庆荣掂量再三，一声

不吭把电报收了起来。过了半个月，任务完成了，他才匆匆地赶回了家。

看到病床上被病魔折磨成皮包骨的老父亲，涂庆荣的心像刀割般难受。他是家中的独子，也是家里的“顶梁柱”。探亲期间，涂庆荣在相距100多公里的家和医院之间来回往返——父亲在医院，母亲在家里，一边是病重的父亲，一边是身体不好的母亲，哪一边他都要照顾到。压力自四面八方压来，急火攻心、劳累过度的涂庆荣也得了胃出血。他只能一边照顾父母，一边给自己治病。

可这个时候怎么走得呢？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再看看日渐消瘦的母亲，涂庆荣张了几次口又把话咽回去。他只能与妻子说，可话刚说一半，就被妻子堵了回来：“老子有气没下气，老娘又病成了这个样子，你咋能走？怎么忍心走？”那天夜里他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宿。走吧，实在对不住父母；不走吧，核试验场的任务即将展开，这时他想起了营门上的这副对联。第二天，涂庆荣把对联写出来，贴在了老家大门上，又把“无情无义无孝”六个字贴在他的床头。

车票买好了。涂庆荣有生以来头一次在父母面前撒了谎，一个永远无法补救的弥天大谎！他对病床上的父亲说，回家看看母亲，让妻子先照看两天；回到家又对母亲说，去医院照顾父亲……飞驰的列车载走了一个“无情无义无孝”的儿子。

就在归队后的第十三天，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场任务工地，教导员面色沉重地递给他一封电报：“父故已葬，保重勿念，妻”。涂庆荣再也忍不住不住内心的巨大悲痛，“咚”的一声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那是罗布泊的一个夏夜，涂庆荣记得那晚的月亮好好好月圆。

那一天，我从马兰出发前往核试验场，眼前还是当年的荒漠，还是当年的热土，还是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官兵。在车上，我与“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唐武祥聊到了英雄话题。他说英雄出自平凡，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大局的人都是英雄。他在罗布泊已奋战了34年，无数的战友、王发元、涂庆荣们像戈壁滩上的小草，把根深深地扎在亘古荒原，默默奉献、青春无悔。现在，他接过前人的接力棒，身上迸发出的还是当年那股劲。

那天，站在“永久沾染区”石碑面前，见证了一批又一批“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儿女的太阳依然热烈如昨。举目环望，天地辽阔，我分明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耳畔回响：“如果60年代，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现在能不能算个大国，有没有这样的地位……”

我想所有中国人都清楚这句话的分量！而眼前的石碑无言，我们的英雄无言。

十一假期回皖西老家，父亲得意地向我展示他正在制作的盆景：白底青花瓷的浅瓷盆，一棵盘根错节的松树卧在一边，另一边立着几块形态各异的石块，石块旁还精心搭配了一簇簇野生的竹子和一些垂落的金钱草。“怎么样？”父亲一边低头侍弄着，一边问。“嗯，不错，设计得好”我啧啧称叹。“看到这些石块了吗？我特意选了5块颜色不一样的。”父亲一片一片地整理好盆沿边垂落的金钱草。“老爸，你不说我还注意到呢”，我仔细一瞧，5个石块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形态、纹理和色彩，大体为：白、青、红、褐、黑。“这几块石头我找了很长时间咧，我还给取了个名，叫五彩峰。”父亲兴奋地搓了搓手，小心地把花盆捧到一边。

第二天早晨，我刚吃完早饭，就见到父亲蹲在院子里，低着头摆弄什么东西。走近一看，他正把一簇簇毛茸茸的青苔铺在那盆景裸露的泥土上。“嗯，少了，再去找点。”父亲低着头嘀咕着。父亲拎着小篮子，又从墙根、道旁采来不少新鲜的青苔，再一块一块地铺好，最后拿来高压水壶，“噗”，一片水雾过后，松针、竹叶、青苔都挂着娇俏的小水珠，越发清润可爱。父亲停下沾满泥土的双手，蹲在花盆边，满脸笑意地凝视着自己的杰作。

父亲最爱侍弄花草，老家不大的院子里热闹地挤满了各种花草果木。院里的平房顶上是一架葡萄，葡萄架是父亲亲手用砖块、木头搭的；窗口前是一棵石榴，经过父亲的嫁接，能结红、白两种石榴；花坛里有桂花、梅花、柿子树、芍药……花坛沿、院子里、房间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花盆，栽种着兰草、金银花、天竺、三角梅、月季、栀子……父亲早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这些宝贝疙瘩浇水、施肥、除虫、修剪。

花坛里有一棵梅花。父亲用铁丝、线绳攀住梅花的枝条，塑出造型，还从其他品种的梅花上剪下枝条，嫁接上去。于是，这棵梅花竟能开出深红、淡绿、浅粉三种颜色。这棵梅花的枝条“旁逸斜出”，伸到了花坛外，父亲又舍不得剪掉，于是就吩咐我们经过时一定要小心，不要碰了它们。尤其到了冬末春初，梅花打苞、盛开之时，父亲恨不得端个板凳坐在梅花旁守着，生怕我们把脆弱的小花苞碰掉。有时，家里来一些顽皮的孩子、粗心的客人，父亲回来后，见到碰落的小花苞，总是心疼地一一捡起，小心地放回梅花树下。

父亲的宝贝

□齐晓坤

父亲爱花，尤其爱香花，他总爱嗅着满院的花香，自豪地说：“咱家一年四季都有花香。”父亲经常拉一把椅子，捧着一盏茶，坐在院子里，闻着花香，自得其乐。每年，这些花香总是引来不少亲朋好友的艳羡，总有人要求：“我能摘一些带回去吗？”母亲总是小声吩咐：“偷偷摘一点，从不显眼的地方摘，他爸知道了心疼。”

一年初春，茶几上一盆红梅开得尤其繁茂，父亲多年的老同学、老哥们来家里做客，一进门就看中了那盆红梅，让父亲送他。这位叔叔知道父亲的性子，是好多人一个，对陌生人都有求必应，何况是好多年的好兄弟呢。没想到，父亲竟一口拒绝。饭桌上，两人推杯换盏，酒意微醺，父亲仍然坚决地摆手、摇头，表示不能割爱。酒足饭饱，这位叔叔告辞之时竟然趁着父亲不注意，抱起花盆，拔腿就跑。父亲一路追过去，这位叔叔早就钻进前来接他的汽车，从车窗里得意地向父亲挥手再见了。父亲垂着头回到家中。“送就送了呗。”我和妈妈都劝慰爸爸。“哎，他不是真的养花爱花的人，我担心我的红梅……”父亲叹着气，收起了茶几上那个孤零零的白瓷盆钵。第二年，我们全家去那位叔叔家做客，父亲下了车就冲进屋问：“红梅呢？”那位叔叔尴尬地笑了笑，指给父亲看，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花盆里只剩下一个干枯的、黑乎乎的小树桩。后来，每年家里梅花开的时候，父亲总念叨着那盆红梅，每每说起，都唏嘘不已。

父亲这一生平淡无波，无波无澜，一直都在悠悠然、笑眯眯地爱着他的花草，他的宝贝。



原上草

齐晓坤